
从通俗小说看转型期中的知识分子面影

——论姚鹓雏笔下的知识分子形象

范伯群¹

(苏州大学文学院, 江苏 苏州 215123)

【摘要】: 中国传统小说、戏曲对知识分子着墨不多, 现代通俗小说中, 却很有些光辉的知识分子形象。姚鹓雏对知识分子的了解非同一般, 在其社会小说《恨海孤舟记》和《龙套人语》中有着众多时流名士: 杨了公、张謇、章太炎、宋教仁、刘师培等一时名流均在小说中得到了书写。姚鹓雏笔下的知识分子具有“功成不居”“刚正不阿”的亮色。两部小说均集中书写了饱学名流章太炎的勇而无谋、赤子之心, 并以自己的才情与两部小说中的人物赵栖桐、魏敬斋相融通。这些知识分子有着许多转型期中的知识分子特色, 他们成不了时代的缔造者、牢笼的破毁者, 但他们身上凝聚着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可贵品质。

【关键词】: 通俗小说 姚鹓雏 知识分子 转型期

【中图分类号】: I206.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4403(2022)01-0158-08

中国的小说、戏曲有歌颂民族英雄的优良传统, 有礼赞清官的新腔老调, 可是对知识分子却相对要冷淡得多。一部《儒林外史》脍炙人口, 当然是由于它的高超的艺术, 但对士人的讽刺也是达到了顶峰。它也有自己的楷模, 那就是像王冕这样避世的人, 即所谓清流, 超然物外, 清白自许。在这纷乱的世界中, 此种隐逸态度虽也独善其身, 但对社会缺乏一种责任感, 也不可能成为时代推进的动力。

一、“功成不居”与“刚正不阿”的亮色

可是, 在现代通俗小说中倒很有些光辉的知识分子形象, 其中的原因之一是他们从生活的直感出发, 甚至从生活的原形出发, 信服地写出了几个令人敬仰的知识分子。我们往往将有的作者不懂阶级分析看成是作者世界观的一种局限, 其实是不能一概而论的。

请想一想, 如果鲁迅在前期就懂得阶级分析, 他就决不会去写阿 Q 是未庄的一个雇农。那么中国小说的典型形象画廊中就没有了阿 Q 这一人物。同样, 这些现代通俗作家站在光辉的知识分子面前, 不会去吹毛求疵地分析他们的“两面性”与“三面性”之类, 而是秉笔直书。

通俗作家姚鹓雏早年曾是京师大学(北京大学前身)的高材生, 与林庚白有“太学二子”之目, 辛亥革命时期就从事新闻工作, 后虽转入政界, 但从政之余, 还是在几所有名的高等学府兼任教职。他对知识分子的了解是非同一般的, 特别是一些有名望的知识分子, 对他们的为人文乃至掌故轶闻颇为关注。在他的笔下, 就有各种类型的知识分子的形象。他的社会小说《恨海孤

作者简介: 范伯群, 苏州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主要从事中国现代文学、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研究。

舟记》(1915)和《龙套人语》(1929)中有着众多的时流名士。

在《龙套人语》中他以乡先贤、松江名士杨了公(在小说中名尹几园)为模型,塑造了一位颇有亮色的知识分子形象。尹几园既是一位仗义疏财的富户,又是松江城里的一位很有学问的“狂士”。他家境优厚,无志功名,一心办地方公益。姚鹓雏是通过几个真实的故事一下子使读者与人物贴近了。当时江苏省松江县城(现属上海市)里有一个大火药库,如果一旦失慎而爆炸,就会危及这个小城一城百姓的身家性命。

尹几园一再为民请命,向提督知府提出搬迁至城外荒无人迹处去。可是提督知府一再以“没有钱”三个字来搪塞推托。这样的官吏昏庸已经达到了极致。他们非但不顾老百姓的生命安危,就连自己的乌纱帽也置之度外了。因为一旦爆炸,人民虽然遭殃,他们自己即使不遭横死,那乌纱帽也是保不住的。上面要平民愤,就得拿他们的塞责来开刀。但他们的推委也留给尹几园一条后路——一个很大的活动空间:只要有钱,这火药库的迁移还是能够实现的。这位轻财仗义的富户为救一城百姓,防患于未然,决心以募捐来解决这一难题。

在通俗小说中常写一种“善棍”,这些人的职业就是打着行善的招牌,募捐以中饱私囊,却又为自己博取“大善士”的美名。这种“善棍”做得有了名望,每逢某省受了特大水旱灾,是要发大财的。一方面以救灾为名,到处捐募敛钱,又拿其中的极小部分到灾区去赈灾。每到一处,作福作威,连当地的官员也敬若神明,因为一旦他们上告,地方官吏将会受到大处分。在通俗小说中写这种“善棍”也是令人发指的。可是在《龙套人语》中,却真正写出了一个大善士,写了一个“损己利人”的知识分子。

尹几园为拯民于水火,自己先拿出三千元,以表示诚意与决心,同时也以此来堵住想一毛不拔的士绅种种借口。以这三千元打底,到各富绅家去善言劝募,好不容易集腋成裘,凑满了上万款项,将这个火药库迁到了城外荒僻地段。尹几园真可谓一时义声遍于乡里,可是在其他富户眼里,他却是个叛逆。因为就迁移火药库一事来说,还是情有可原的。你尹几园“怕死”,其他被劝说而捐募的富户也是怕死的,损失几个钱也就算了。但尹几园的“损己利人”,并不到此为止。他还关注贫民百姓的疾苦:“他曾因农民担负田租业主征取过苛这个问题,发起过一个佃户会,召集佃农,商量减纳,几乎激起风潮。”¹在其他富户看来他简直是“吃里爬外”的掘墓人了。

以上这个情节,已有许多新潮成分了。但作家姚鹓雏还着重写此人的“转型期”知识分子的特征。在辛亥革命时期,民军即将要入城前,尹几园独自跑上城楼,竖起了两面白旗,顿时将龙旗打倒。再加上其他诸因素,总之,“革命军也不费一矢,能成大功”¹。光复了松江县城。“几园以一介书生,竟能高揭白帜”¹,一时传为美谈。光复之后,他又“功成不居”,仍旧做他的诗,参他的禅,散他的财,不失书生本色。尹几园还在地方文化事业上舍得花钱。

他看到松江虽有中学与师范,但只收男生,没有一个女子求学的场所,就捐款办起了“慕彤”女子学校,开松江风气之先,还自任国文教员。有的满脑封建思想的人却认为这是伤风败俗,“女子无才便是德”是他们不二的信条;但最主要的富户们怨恨他的仗义散财衬托出他们的守财奴的本色。这“一散一守,相形之下,他做了个轻财仗义的侠士,岂不是其他富户尽做了嗜利忘义的钱虏?你想那班人心里,岂有不恨”¹。

尹几园散财的结果是家财告罄,还负债不少。可是他又办了一个孤儿院,那是只能靠他的卖文鬻字的收入来充孤儿院的用度。这样的事迹是有真人真事作为依托的。作为知识分子,他为教育事业不遗余力。可是在解放后,我们对尹几园的原型杨了公是讳莫如深的,50年代初,一部表扬武训的电影,找来无尽的麻烦。全国一阵罡风狂飏,谁还敢去提起这个杨了公呢?也根本想不到在1929年出版过一部名叫《龙套人语》的小说中,竟有这么许多知识分子为社会添了几许“亮色”。

政府的官员一般总要有文化的人做的,也就是说,官是要由知识分子来做的。可是进了官场,知识分子得去掉书生气。如果不肯同流合污,还是保留书生本色,那总会显得不合时宜,在场合中总会显得格格不入。即使你是一位干员,也是终究要被排斥

的。《龙套人语》第十六回中的孙思礼(子才)就是这样的一位官员。

孙思礼平息浙江省萧山县(现属杭州市)教案一事,是令人钦佩不已的。“那时外国人初到内地传教,民教冲突之事,非常之多”。²这样的问题往往是极为复杂的。这里有帝国主义的文化侵略问题,有普通外国传教士传布宗教的自由问题,有官员的恐洋症问题,有少数民族败类,做了教徒依仗洋人势力、欺侮同胞的问题,也有贪小之徒“吃教”的问题,还加上中国乡民自卫心理的问题,也有愚民政策下的排外主义和聚众闹事等问题。

萧山教案的严重性在于“乡民乱纷纷,足有五六千人,手拿着锄头扁担、劈柴刀斧之属,正在呼号叫骂,要焚尽全县教堂,杀尽全县教民”²。声势汹涌,聚众闹事。这个场面是很难收拾的。乡民不散,官府要镇压;镇压一旦失控,全县将受巨大的损失;洋人被杀,就会引起国际纠纷;教民被戮,将良莠同焚。总之这种局面到了一触即发、难于驾驭的边缘。

官府却只有用兵屠杀的老套路,听到孙子才愿去平息纷争,就问他要带多少兵勇。孙子才认为此种局面,一带兵勇易于双方对峙。他愿不带一兵一卒,只带两个亲随前去抚平百姓的怒火。他也不入城,而是在路边饭店里卸下行装,叫亲随去找两根长竹竿,每竿上扎一方白布,制成两面旗子,亲笔题写上“奉谕来办教案”“诚心救我萧民”²十二个大字。叫亲随一人一面旗子,掇到乡民集中的小山头上。他有一篇慷慨淋漓的即席演说:

“你们且不要乱,听我一言。我虽是奉抚台的札委而来,实在是来救你们萧山全县百姓的。我是中国人,读的是中国的书,做的是中国的官。你们这种爱国的良心,我心里也很赞成,不过可惜用得不好。你们现在聚众围城,形同反叛,杀洋鬼子没有杀成,先自犯下了灭门大罪。一旦朝廷知道,派兵剿办起来,你们想想,值得不值得了?况且你们平日本是安分耕农的好百姓,试问能抵敌枪械俱全的官军吗?再者你们本意,不过仇恨洋人教民,不知洋人果然不好,自有抚台办他。

教民更容易了,按律治罪,还怕逃到那里去。何由你们自由行动?我因为爱惜你们一片爱国愚忠,自己不晓得已犯了国法,所以特地在抚台大人前讨了这个差使,来劝谕你们。如其听我良言,你们便可立刻散归,候我回明抚台,把洋人教民一一究问惩治。

如果十天之内,没有动静,你们再自由行动,也不为迟。如不听我言,你们就先杀了我,免得我眼见你们陷于大辟,玉石俱焚,心中不忍。你们细细去想,究竟是走那条路好?我孙思礼单身到此,不带一兵一卒,决不是顾惜性命畏首畏尾的人,尽可以听你们处置。”说罢从容挺立,气概凛然。²

孙思礼的话当然有许多局限性,可是他的这一席话在当时却起了作用。接着是义正辞严地与洋人谈判,洋人见了有这样伟力的官员,也只能暗暗钦佩,问题也易于解决;又惩治犯罪的教民和滋事的乡民,三下五除二地了结了天大的风波。可是就是这么一位“通省第一能员”,却屡屡不得升迁,这就是当时官场的黑暗,容不下刚直不阿的能人。看样子孙子才书是读通了,可是官场的门径没有摸通,也不屑去摸,也不愿同流合污。这正是一腔知识分子的傲气与一身“书毒头”的傲骨!

说到尹几园与孙思礼,虽有可歌可泣、可圈可点的业绩,不过他们的原型还不太有名,只是小有名望而已。可是在《恨海孤舟记》和《龙套人语》中姚鹓雏也写了不少名人,在《恨海孤舟记》中,他涉及的名人有宋教仁、陈其美、蔡锷、章太炎、刘师培、杨度、何震、柳亚子、叶小凤、苏曼殊、陈去病诸人。在《龙套人语》中涉及的名人更多,因为他要写的就是“记载南方掌故,网罗江左轶闻。说句旧话,便是野史稗官,聊以备方志国书的考证”³。

除了江南政要一定会列入知识分子的行列,但有些历史上曾大写一笔的人物,如“江南无冕皇帝”张謇就整整写了五章,写他不仅有极大掌控的政界腕力,连他与绣娘沈寿的一段瓜葛,请梅兰芳和欧阳予倩赴南通演出,皆有所涉猎。又如记南社虎丘雅集;弘一法师在虎跑某寺庙做小沙弥等也有详略不等的记述。

至于梁启超与章太炎在南京讲学的盛况，更是写得栩栩如生，音容笑貌，宛在眼前。由于这两部小说中写章太炎的铁事较多，我们不妨花一点篇幅，把镜头集中在他身上，用以探索知识分子在转型期中的种种处事行状。

二、勇而无谋、赤子之心的饱学名流

章太炎是个兼学问家与革命家于一身的人。作为革命家，他不仅在辛亥革命期间有其光辉业绩，以后对居心叵测的袁世凯，他也有威慑力量。章太炎的骂声，令袁氏头痛万分。他发给章太炎大勋章，但章太炎却拿大勋章当作扇坠，在总统府门前摇着扇子，幌着扇坠，大骂袁世凯。于是给他起个绰号——“章疯子”，意在叫人不当他一回事，意思是疯子讲的是疯话，不能当真的；可是人家就喜欢听这章疯子的疯话。来硬的吧，暗杀，这是袁世凯的拿手杰作，可是他影响太大，再说他还不像陈其美、宋教仁那样，非杀不可以让袁坐稳总统的宝座。

而杀章则是不合算的，他不过在舆论上使袁不得安生，如果杀了他，国内外反响很大，收获却一般，仅不过耳根清静一点而已。他不像陈其美与宋教仁，你不杀他，他们就会“杀”将过来，要你的命，至少坐不稳总统的宝座，那他的皇帝梦也将落空。袁世凯懂这道理，就对章太炎采取软禁的办法。

在《恨海孤舟记》中主要是写软禁与反软禁的情节。袁世凯将章太炎(书中名庄乘伯)软禁在北京龙泉寺里，不准越雷池半步，好让袁世凯做他的皇帝梦。庄乘伯横下一条心，来个绝食。可是绝了九天，不但没有委顿，“精神反觉得清爽过于平日”。不得已再重新进食。“公府里还不时的虚辞慰问，送酒送食。”⁴

庄乘伯就将酒食摔在地上，当着军警的面大骂袁世凯，可是他们只在一边陪着笑脸，不去睬他。“看官，这种虐待名流的事，岂是共和国所常见的，也只为乘伯一生心直口快，不识风头，才遭此难。”⁴但章太炎的性格写得更精彩的是他在日本友人的策划下，想逃离虎口的一幕。日本友人先叫他穿上和服，还忍痛剪了唇上髭须，化装成东洋的买药人的样子，准备逃出京城：

正是火车将开的当儿，站上搭客一拥而出。那日本朋友正招呼着他上车，猛见人丛里挤出一个人来，穿着件蓝布大褂儿，像个店家伙计打扮，看他倒也和颜悦色的走上前去，对乘伯弯了弯腰，说道：“庄大人，久违了啊！您老一向好？怎不请过来。”乘伯一愣，不觉冲口说道：“你是谁？”那人满面堆下笑来，说道：“庄大人，你真是贵人多忘事啦！小的便是琉璃石厂德古斋里的。大人，你往常没事的时候，总到小店里来逛逛的，小的也伺候你老好几回啦。”说着一边向袋里摸出一扣摺子，乘伯听了，也只模模糊糊的，便道：“你想是认错人了，我又不姓庄，我有事要到天津去，也没工夫和你多拌嘴。”说着举步想走，却被那人双手拦住，笑道：“且慢！庄大人要到天津去，我也不敢拦你的驾，不过有一笔账，请大人就算算。”说着就递过那摺子来。乘伯惊道：“我几时欠你家的钱，你这人好没道理，只顾胡缠。”说时，车已将开，汽笛呜呜的响了。那日本朋友急的只把眼来瞪着他，又见是索账的事，不好来管，早见有几个军官装束的人走了进来，见了乘伯，还举手行了个敬礼。笑道：“庄大人，在这里什么事？”又向那人道：“你这人好不睁眼，扯着大人做什么？府里有事要请大人去啦。”说着便去扯开那伙计，那人只自笑，也不争辩。此时车站站长也走了进来，对着乘伯只自打恭作揖说道：“不晓得庄先生驾到，没有招待，失礼得很！”庄乘伯急得暗暗顿足，说道：“你们不知，我有急事到天津去。可奈那个人胡言乱语的打搅人。”站长笑道：“先生别怪，别的事小可不敢管，先生是大总统命令我们保护着的人。到天津去的事，没有公府里吩咐，小可却不敢斗胆叫先生去。”乘伯大怒道：“我偏要去，你们又该拿我怎样？”站长只顾笑，也不回答。几个军官，做好做歹，把那伙计拖了开去，便道：“马车已套好了，请大人就去。”乘伯嗔目道：“哪里去？”军官笑道：“公府里一早传出话来，叫请大人进去，有面谈的公事。我们四处都找到了，却不晓得大人要到天津去。”说到这里，笑了一笑，便也不由乘伯分说，半拖半扶，把乘伯簇拥入马车里，加上一鞭，风驰电掣般，直向总统府去了。……乘伯到了公府，总统却给你一个不见，任乘伯在府里客座上大跳大骂，只是个不见不闻，足足挨了三四个钟头，乘伯火气也挫了些下去，才见步军统领、巡警总监两个人，一先一后走了进来，对乘伯陪话，跳了个三花脸儿，劝着乘伯回去。乘伯一面走，一面说道：“你们别太高兴了！这压力不是可以常用的，你们现在果然是狐假虎威，张牙舞爪，我看冰山一倒，你们还有这样势力吗？到时候，我还要来抚着你们的没头尸体，凭吊一回哩。”⁵

这简直是袁世凯导演的三簧戏，先叫一个小特务来纠缠住章太炎，然后又是军官又是站长，几管齐下，逼你就范。而章太炎的性格也跃然纸上，这个书呆子连一个化了装的伙计也对付不了，怎么能有计谋去对付袁世凯呢？动不动就是“赤膊上阵”，大跳大骂，敌方却正中下怀，暗暗窃笑。因为你虽然是知识分子，但你的战法却是《三国》中的许褚式的。文章写得头头是道，颇有谋略。可是在文章之外的实战中，却有勇而无谋。但章太炎的赤子之心，倒实在是令人感喟的。

袁世凯这个洪宪皇帝龙驾归天了，在军阀统治时期，章太炎想做学问了。他也有学问，他的学问对当时与后世都是有价值的。当时南京的东南大学曾请梁启超去讲学，因为素享他的文名，如雷贯耳，再加上他做过总长，在官场中也有影响，所以听讲者风起云涌，可谓万人空巷。连厅长、处长，也高车驷马，前来凑趣。谁知这位梁先生一口粤音官话，按他事先编好的讲义，照本宣科，毫无穿插发挥，一个原来围得水泄不通的礼堂，渐渐就小猫三只四只了。才知道梁先生的一只钝嘴，敌不过他的一支锐笔。梁先生自知不妙，赶紧偃旗息鼓而去。可是那位曾经在日本以其博学“征服”过鲁迅的章太炎可不同了。他到南京，风光一时。以他的儒宗大师身份来整理国故。别说是在课堂上侃侃而谈，滔滔汨汨，雄辩无穷，就是在秦淮河的游船上，也由他包场，且食且谈，诸子学、佛学、文学，无一不说，无说不详。而且在两段话之间，从没有相隔二十秒钟的，总陪客只有洗耳恭听的份，别说插嘴，就是一个标点符号也插不进去的。有一天老先生忽然雅兴大发，要游南京的半山寺了。在游宴中，庄先生还是滔滔于他的讲说。忽然有一位老教授来了个突然袭击，问道：

“庄先生，请教就这半山寺的名称而论，即使不一定在半山里，也必定离山不远，何以这寺又在城里？四面并无一山，是何缘故？可否赐教解释解释？”众人见那位突如其来的一问，倒颇觉得异想天开，未经人道，不禁大家目注庄遁庵，看他如何回答。遁庵略停了停，即说道：“那是有原故的。当初王荆公舍宅为寺，原名报宁。何以称为半山呢？志书上载着，宋时锺山去城十四里。这报宁寺地方离城七里，恰为城至锺山的一半路，所以称为半山。如此则半山寺应在城外的了，何以此刻又在朝阳门内呢？因为此刻之城，非那时之城。此地宋为江宁府……当然比‘明朝定鼎，缮治国都’的南京城，要小得多。所以在宋时，半山寺距城还有七里之遥。而现在的南京城已将半山寺收在城里来了。”众人听了，觉得他随口说来，确有根据，自然都佩服庄先生的淹博无伦。⁶

这一则轶事说明章太炎学问的广博，他对王安石的研究当然不在话下，而且对舆图的变迁，也即对地理史的研究也是博识的。总之他对这个突如其来的问题的回答，显示出一种综合性的实力，经他的融会贯通，才能如此有说服力地讲清了不动的半山寺与变动的南京舆图之间的关系。

据说章太炎是一个出了家门就不认识自己家在何处的人，只知上了人力车，叫车夫拉回家去。车夫问道，您老家在何处？则答曰，我家你也不知道？弄得笑话百出，日后，只好由夫人将家庭地址写在纸上，出门时交给他，叫人力车时，自己看看纸条，然后将目的地告诉车夫。这又是章太炎的一则轶事。与说出半山寺的来历相比，真可谓大智若愚。他的脑力全给了学问，而自己的生活必需倒是一问三不知，或者说简直是无知。

鲁迅对这位老师是既有所肯定也有所批评的。鲁迅在临终前，接连写了两篇关于章太炎的文章，其中一篇是他逝世前二日搁下的未完稿，读后觉得鲁迅对这位老师有一种“尊敬的贬意”。也许是鲁迅在当时太崇尚革命，而将学术放在次要的位置上了。鲁迅说他“既离民众，渐入颓唐，后来的参与投壶，接收馈赠，遂每为论者所不满，但这也不过白圭之玷，并非晚节不终”⁷。看来鲁迅还是笔下留情的。但鲁迅对有的事实并没有知晓清楚，例如投壶的仪式，章太炎是没有参与的。或者孙传芳是请他了，但他终于没有去。当时孙传芳在南京设立婚丧祭礼制会，特聘儒宗大师章太炎为会长。在《龙套人语》中第18章，是专门用一章的篇幅，讲了这件“公案”。即《乡饮投壶先后礼大庠入彀偃武修文》一整章，其中就讲到章太炎未参与投壶，现在《鲁迅全集》的有关注释中也证实了这一说法。姚鹓雏的《龙套人语》中更精彩的是说清了为什么这些军阀藩镇会如此欣赏章太炎，把这位儒宗大师也卷了进去，使他红极一时，弄得后世对他有种种非议：

师孟道：“庄遁庵（即影射章太炎）近来在这班藩镇之间，红得了不得，真可以算是诸侯上客，但是他所讲究的‘国故’，并不是为帷幄运筹用的。他们请教他是些什么？我倒不懂。”敬斋道：“有甚不懂。我好有一比，便是比如我们卖书画的。人家说卖

书画，简直可以说末等的生意了。因为书画这一类东西，既非如粟米之疗饥，又非如珠钻之可贵，穷的人买不起，不消说了；稍为够过的，也不要买这类不急之物。至于大家巨阔呢，钱是有的，也尽有余暇来考究那些，可是他家里的古董书画，早已装满了几十个木箱，又无须我们那种新鲜出品。算来算去，惟有那种暴发财人家，骤然间有了钱，便要装潢门面，附和风雅，那便是我们这行买卖的唯一受主。可是在这唯一受主——暴发户的心目中，还要分几个等级次序。当他发了几十百万的财之后，要穷奢极欲起来，便先是锦衣玉食，次是娇妻美妾，到最后——方才是住的问题。于是乎必须盖新房子，以满足他住的奢侈。盖起房子来，如其他盖的是洋式巨宅，还需要不到我们这种东方艺术的书画。照此程序推算下去，第一步要他发财；发财之后，第二步奢侈到衣食；衣食之后，第三步到妻妾。妻妾之后，第四步到洋房汽车。只在这第四步之中，有一条小小叉路，便是希望万一那暴发户——唯一一盖的是中国式房子，那才有挂我们那种旧书画的余地，那才可以讲行情论交易。还要人情熟练，应酬圆到，方可得到这唯一受主之一顾。你想这种买卖难乎不难？这类职业可做不可做？可是现在那些大军阀、大将军，在金钱权势上固然完全是一个大大的暴发户，论起他的知识来，又只想盖中国大厦，而不想收罗‘洋才’，所以这东方书画式的庄遁庵就值了钱了。现在那庄先生便如一张吴仓石的花卉、康有守(影射康有为)的大字。那些大将军的地盘，便如新盖的中国式的大厦一般，东也要拿他去挂两天，西也要拿他去悬几日，以表示他们暴发的神气，礼贤的盛事，于是乎庄先生乃大红而特红。”⁸

这一段精辟的论述，似乎能说清这位儒宗大师被包围的时代背景与人文环境。知识分子，特别是他们之间的名流，有时也是身不由己的，当然，在原则问题上应该是应该把握自己，而不能使自己失足的。

三、以自己的才情与作品中的人物相融通

姚鹓雏这两部写了许多知识分子的小说，还有一个特色，那就是皆以知识分子的目光与视角看知识分子。为了取得这样的效果，他让这两部小说的“贯串人物”皆是知识分子。《恨海孤舟记》中是赵栖桐，而《龙套人语》中是魏敬斋。

赵栖桐此人的出身倒是与作者姚鹓雏相近的，二人皆是京师大学的高材生。皆是辛亥革命时风闻满清要封城杀汉人，京师大学因此停课，疏散学生而南回。到了上海，就由程伯生(影射陈陶遗，江苏同盟会支部长)推荐给花吴奴(影射叶楚傖)，在他主办的上海《东海日报》任编辑，与他共事的有杨平若(影射柳亚子)等人。这也与姚鹓雏的经历相仿。小说中穿插了两个妓女与赵栖桐之间的柔情蜜意是否与作者的身世相同呢，就不得而知了。

但小说作者也是很为他笔下的赵栖桐开脱的，主要是因为世情黑暗，“狐鼠凭城，豺狼当道”，而自己则像一叶“恨海中的孤舟”，在“朝局尽翻，民生憔悴”之时，只好以“妇人醉酒”为遁逃数而已。⁹于是小说的结局是非常消极的。赵栖桐看破红尘，出家云游四方去了。书中说：“我便想做个游方僧撑着冷眼看尽世人哩。”⁹这就是说，作者没有去发掘赵栖桐积极的一面，因为他从北京到上海之后，四周所接触的都是当时的知识精英，不少是积极入世、前仆后继的革命党人。这《恨海孤舟记》的价值之一，就是为当时的一段史实与活跃在其中的真实人物，留下了足迹。可是写到贯串人物的命运，却不同了。

这和作者的思想也好像有共鸣处，他在这部小说脱稿后所写的《自序》中说：“鹓雏之生，二十有六年，容色苍老近三十许人，发有数茎白者，或者诏我，忧能伤人，子弗复乐。夫工愁善感，出之天性，即有津梁，弗能度也。抚膺四顾，百端交集，如信潮之弗可止，如奔涛之弗可御也，则我其为恨海之孤舟云尔。作《恨海孤舟记》。”⁹可见消极遁世的观念人物与作者也是有些相通的。不过他没有像赵栖桐一样去出家为僧。那么我们不妨再作一点考证，即使是“妇人醉酒”这一点上，两者也是相近的。我的有力旁证是在毕倚虹的《人间地狱》中，有一批知识分子的身影，活跃其间。苏玄曼实乃苏曼殊，姚啸秋是包天笑，柯莲生是毕倚虹，华雅凰是叶楚傖，而其中也有一个赵栖桐，影射的就是姚鹓雏。不过在毕倚虹的笔下，此人不是个玩弄女性者，倒是与某妓“相濡以沫”的书生。如此看来，《恨海孤舟记》颇有些自传体的况味，不同的是作者不像贯串人物去出家云游，而是从新闻界转入政界，做过江苏省长公署秘书、南京市政府秘书、江苏省政府秘书。从政之余，先后在东南大学、河海工程大学、南京美专、江苏医政学院任教，主讲国文。我还在一个资料中看到，在国民党临败退去台湾时，他还去看过于右任，他们大概都不是国民政府中的主流派，尚对政局有清醒的一面。这样的人，身在淤泥之中，又幻想出淤泥而不染，也是极为苦闷的，可见，他们的灵魂是在云游四方而不得安生的。为证明我上述的分析，我再举一个旁证：解放之后，姚鹓雏是上海文史馆馆员，并经陈毅

元帅之提名，被选为当时松江县副县长，也是个统战人物，至1954年病逝。这个赵栖桐与姚鹓雏是可以作为具有两面性的知识分子细细剖视的。

《恨海孤舟记》写于1915年，连载于包天笑主编的《小说画报》上。《龙套人语》写于1929年，笔名龙公，先连载于上海《时报》。解放后出版过一次，改书名为《江左十年目睹记》，是根据柳亚子的三卷手抄本排印的。将自己安排在“跑龙套”的角色上。写的主要是江南的种种轶事。心情是和恨海中的一叶孤舟相似：“龙公百无聊赖，将十年来心头的旧事，雨窗月槛，一一重温，酒后茶余，闲闲点笔……”¹⁰一位并不认识作者的老新闻工作者、老作家、老剧评家冯叔鸾却也为这本书写了一篇《序》。既高度评价了这部书的价值，也一针见血地看出了作者的心态：他认为该书中的事“更廿年后，必将无人能悉，且无人能述。赖有此书，详其颠末。以意度之，著者必为文章识见绝人之士，而沉沦于末寮者，故能巨细靡遗，滔滔不尽，若数家珍。虽曰诙谐以出之，而言外余音，固含有无限感慨，殆所谓伤心人别有怀抱者耶？”¹⁰细细品味起来，它与《恨海孤舟记》是略有不同的。经过了这十多年的世事磨炼，作者不再是一个赵栖桐了，而是变成了参透世情、老辣无比的魏敬斋。

魏敬斋是一位阅尽人间沧桑的“硬里子”的老名士，他已经达到了“清狂自许，荣辱无关”的炉火纯青的境界。他浮沉薇署一十五年，至今还是一个科员¹¹，“他听见有将要给他科长做之讯，大大摇头表示不愿”，在他看来，无论“什么厅长、科长，无非混饭而已”¹¹，他画得一笔好画，另有一种超秀出神之致。这种超拔不羁的秉性，使他对一切功名富贵视若粪土。他诗画卓著，傲才视物，真是看透了这个世界，否则对藩镇为什么要如此捧章太炎的一番道理，能说得那么鞭辟入里吗？他也决不是“政盲”，他懂得“天下老鸦一般黑，同一军阀，断分不出是非好坏的来的。……人心之怨毒，已至沸点”，“盼望南方革命军来，有同望岁”。¹¹这部《龙套人语》，以他为贯串人物，格调自然就高了。

姚鹓雏用两个知识分子各贯串一部社会小说，使我们看到两种类型的转型期知识分子的面容。这两个人与作者的气质是相同或相近的。赵栖桐在茫茫的人海中，觉得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在人海的荒漠中，独怆然涕泪滂沱而已，这是正直的知识分子的典型的“彷徨症”。魏敬斋是距赵栖桐十多年后的姚鹓雏，魏敬斋也像作者一样，是个浮沉薇署的角色，这是个坐在“冷板凳”上看当今的“热门人物”，可谓“阅尽人间”的智者，为读者一一指点评判。但他意犹未尽，还给作品添涂了亮色，那就是像孙子才与尹几园一类“民族的脊梁”。在他们的身上，我们或许还能看到《儒林外史》中的王冕的身影，动不动就要超然物外，清白自许的，但他们毕竟有着许多社会转型期中的知识分子的特色。他们成不了时代的缔造者、牢笼的破毁者，但是他们身上凝聚着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可贵品质。在《儒林外史》以讽刺见长的文学名著之外，也为若干知识分子唱了颂歌，听来也是清新悦耳的。

注释：

1(2)(3)(4)姚鹓雏：《龙套人语》，《姚鹓雏文集(小说卷)》下，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813页。

2(1)(2)(3)(4)姚鹓雏：《龙套人语》，《姚鹓雏文集(小说卷)》下，第776-777页。

3(1)姚鹓雏：《龙套人语》，《姚鹓雏文集(小说卷)》下，第718页。

4(2)(3)姚鹓雏：《恨海孤舟记》，春风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第143页。

5(1)姚鹓雏：《恨海孤舟记》，第144-145页。

6(2)姚鹓雏：《龙套人语》，《姚鹓雏文集(小说卷)》下，第737页。

7(1)鲁迅：《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朱正编：《鲁迅选集》第3卷，海南出版社2013年版，第306页。

8(2)姚鹓雏：《龙套人语》，《姚鹓雏文集(小说卷)》下，第792页。

9(1)(2)(3)姚鹓雏：《恨海孤舟记》，第100、299、308页。

10(4)(5)姚鹓雏：《龙套人语》，《姚鹓雏文集(小说卷)》下，第814、692页。

11(1)(2)(3)姚鹓雏：《龙套人语》，《姚鹓雏文集(小说卷)》下，第783、769、802页。

12 此为范伯群先生的遗作，兹予发表，以志纪念。